《契丹语和契丹文》读后

聂鸿音
(中国社科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中图分类号: H21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873(2009)02-0137-03

自从 1922年辽陵帝后哀册在内蒙古巴林右旗出土之后, 学界围绕契丹语文的探索已经断断续续地进行了 80多年, 但是解读这种神秘文字和语言的征途依旧漫长。当下如果有人试图加入这个研究队伍, 希望尽快掌握必要的基础知识并了解现有的研究状况, 那么我觉得他最应该读的一本书就是刚刚在荷兰出版的《契丹语和契丹文》(The Kitan Language and Script, Leiden: Brill, 2009)。

一

《契丹语和契丹文》的作者康丹博士(Daniel Kane)是澳大利亚麦柯理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的汉语教授, 20世纪 70年代初曾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 后来担任过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由于受过专业训练并在北京生活多年, 他能讲流利的汉语, 并且对中国北方民族古代语言有着极大的兴趣, 早在 20年前就发表过一篇关于《女真译语》的研究文章(The Sino-Jurchen Vocabulary of the Bureau of Interpreter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89)。他的作品风格总是在平易里透着亲切, 而不像中国的有些同类著作那样, 时常带有某种令人不解的偏执。作为"东方学手册"(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系列出版物的一种,《契丹语和契丹文》遵循的是国际上"手册"类著作的标准写作模式, 这决定了该著作不是一定要提出某种新理论或者研究某个新问题, 而是要对本领域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现状做出全面扼要的介绍, 以作为初学者的津梁。从某种角度上说, "手册"有些像我国传统的目录学, 只是它更加重视学术发展脉络和最新研究成果的叙述, 一般不集中于对以往研究著作的逐一评论。

《契丹语和契丹文》全书凡七章, 首章介绍有关契丹语言文字的历史资料、研究概况和语言文字特征, 以下依次介绍契丹小字的形音义、契丹语的语法形态、契丹大字的研究历史, 然后以举例形式解读了"郎君行记"、"耶律敌烈墓志"和"宣懿皇后哀册"三件契丹石刻, 最后一章介绍了作为契丹语文解读基础的辽代汉语方言。书中附有丰富的参考文献和索引, 读者一册在手, 全部资料线索无需他求。

如所周知, 契丹存世文献中没有《女真译语》之类的双语字典和《蒙古秘史》之类的双语对译史书, 因此契丹文字的解读工作进展缓慢, 甚至可以说至今还没有找到一条通向终极目标的途径, 这导致每个研究者都可以凭借零星的资料对文字的形音义做出自己的猜测。即使是同一个研究者, 也常常会在几年内多次改变看法而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应该说, 康丹博士在收集整理现有成果的时候花费了不少心血, 他希望选用被多数人认可的结论, 而尽量避免纠缠于那些昙花一现似的"一家之言"。然而

收稿日期: 2009-09-26
作者简介: 聂鸿音(1954-), 男, 北京人,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西夏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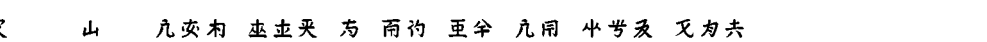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近十几年来的契丹文字解读成果几乎都是在猜测的基础上从铭文中反复比对出来的,这决定了研究者很难就此做出合乎学术规范的论证,即使偶然言中,也终究无法躲避来自方法论的责难。相比之下,契丹语法研究尽管迄今只涉及少量形态学成分,但由于作者的论述比较规范,所以得到的支持意见明显比反对意见要多。面对这种局面,康丹博士在举例介绍契丹字的时候,即使遇到多数人公认的字义和字音,也不得不尽可能地搜集证据为之补出合乎学术规范的解说,而在介绍语法成分时就轻松一些,他可以利用已有的研究著作,比如乌拉熙春的《契丹语言文字研究》(京都: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2004),从中选取合适的例子重新组织一下即可。

"手册"类著作对作者的思想境界有很高的要求,即他必须有能力从足够的学术高度俯瞰整个研究领域的全部成果,对每个研究者的劳动都给予同等的尊重,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个狭隘的专题而对其外的研究妄加褒贬。在这个问题上,康丹博士的著作处理得较好,我甚至觉得他对学术史所持的公允态度应该成为我国学者的楷模。毋庸讳言,我们国内还没有哪本著作或者哪篇论文做出过这样全面的、心平气和的总结。假如有学生希望通过国内报刊了解近时的契丹文字研究史,那么他多半会感到失望,因为文章所展示的大都是作者本人对其卓越贡献和高尚品格的自诩,而极少去关注大批的同行的研究成果。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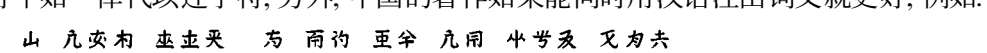
这里想特别指出的是,康丹博士在书中做出的一项努力绝对值得赞许,这就是对契丹小字进行拉丁转写的尝试。他在著作的第 26页谨慎地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研究者在引用契丹词语和句子的时候都不予转写,而在用英文写的著作中不能采用这种方法。"其实何止是用英文写的著作,用中文和日文写的著作同样有必要给出文字的拉丁转写。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契丹小字是一种拼音文字,如果我们只知道一个或几个字符组合在一起所表示的意义,却不知道每个字符的读音,那么我们就永远不能真正理解契丹的语言。事实上,20世纪初期就有学者在解读契丹铭文时使用过拉丁转写,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个良好的学术传统却在数十年后被抛弃了。康丹博士主张恢复这个传统,并且设计了一套初步的转写规则,例如用句号标示契丹"原字"间的界限,用冒号标示契丹词根后附的词缀,等等。同时,为了尽可能地让契丹字与拉丁转写在出版物上形成直观的对应,他还大胆地把原来叠床架屋式的契丹文字改为直线排列。下面以"郎君行记"的第一行为例,这一行的中文意思是"大金国皇弟都统经略郎君":



GREAT GOLD g.úr:en qa.ha:an deu cau.ji hur.ú g.iŋ l.iau.u ś.a.rí

前面两个契丹字知其义而不知其音,康丹博士直接用大写英文意译。对于大致知道读音的后面那些字,他基本上仿照蒙古学界的习惯采用了拉丁转写,至于为什么把舌根鼻音写成了国际音标的"ŋ"而非拉丁字母的"ng",我猜想那大概是为了保持"一字一音"的理想标音原则。当然,如果能在书的适当地方附上一个"拉丁转写和国际音标对照表"就更好一些,读者就会很方便地知道转写的"g"是[k]、"c"是[tʃ]、"ś"是[ʃ],等等。

我不知经他改革的契丹字排列法在今后会不会招致学界非议,但无论如何,新的排列法毕竟显得整齐美观,很好地适应了现代出版物的要求。当然,转写中使用的"句号"和"冒号"让人看上去有点不大习惯,我觉得不如一律代以连字符,另外,中国的著作如果能同时用汉语注出词义就更好,例如:



-- -- g-úr-en qa-ha-an deu cau-ji hur-ú g-ing l-iau-u ś-a-rí

大金 国 皇 弟 都统 经 略 郎君

应该承认,康丹博士的这一尝试极大地方便了语言研究,但同时也带来了研究者们羞于见到的一个后果,那就是把迄今契丹语音构拟的一切缺陷都暴露无遗。上面用来举例的那个词组是迄今解读得最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好的少数契丹语料之一，读者借助蒙古语和《辽史》可以从中清楚地体味到 güren“国家的”、qahan“可汗的”和śäri“郎君”这三个词，可是其中 ging liau（g. iŋ l. iau. u）的音韵结构却让人看上去极不协调——这是汉语“经略”的音译。而我们知道，所有阿尔泰语系的语言都是以单元音为主，双元音已经很少，而 iau 这样的三元音结构实在不像是阿尔泰语的特征。事实上，任何语言中外语音译词的语音形式大都不会是外语的原样再现，而总要依照借入语的音韵面貌或多或少地起些变化。一般说来，两种语言的发生学和类型学关系越远，彼此间的音译词在语音形式上的差异就越大。这就是说，我们在构拟契丹语中的汉语音译词时，绝对不该不假思索地把近古汉语的语音形式照搬过来，而应该尽可能地参照相关资料，比如蒙古和回鹘文献中的汉语音译词，使我们的契丹字拟音最大限度地接近阿尔泰语言的借音习惯。作为一个外行的建议，我想我们或许应该考虑把“略”构拟成 lyo 或者 lyu，这样不但避免了三元音甚至双元音结构的出现，而且还大致与蒙古、回鹘文献中的汉语译音形式相符。

关于音译词还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借入语无论对外语有多大程度的改动，其中一定存在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具体到汉语来说就是，中古等音韵特征相同的汉字在进入外语之后，其读音必然相同。可是我们在康丹博士的著作中却发现了一些打乱语音对应规律的情况，以第二章中汉语匣母字的译音为例：

开口一等 韩 qa. an（2.053），后 heu（2.250）

合口一等 虎 xu（2.036），和 xo（2.057），皇 hoŋ（2.075），黄 oŋ（2.340）

开口二等 行 xa. áŋ（2.280）

合口二等 华 xua（2.143）

合口四等 县 ki. ên（2.163）

同是汉语匣母字，契丹人竟把它们读成了 q、h、x、o、k 五个不同的声母，尤其是古今读音都完全相同的“皇”和“黄”也被分别读成了 hoŋ 和 oŋ，应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另外我们还看到，上面转写作 xo 的“”字在第 41 页第 20 行又转写作 hó，转写作 hoŋ 的“”字在第 51 页第 5 行又转写作 oŋ。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我们的契丹文字转写还缺乏一套语音严格对应的预置规则。

康丹博士本人没有从事过契丹小字的拟音研究，《契丹语和契丹文》中的拉丁转写都是从其他研究者的结论中折合转化而来的。看得出来，康丹博士已经运用其丰富的汉语言学知识对时人的构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调整，为此他还专门论述了当时是否存在汉语和契丹语两套译音字的可能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些固有的理论缺陷。然而可惜的是，契丹字音的构拟毕竟属于先天不足，所以康丹博士的努力并没有带来原有结论脱胎换骨的变革。毫无疑问，现存的转写缺陷不应由康丹博士来负责任，我觉得这反而更加衬托出了对契丹字进行拉丁转写的必要性。作为“手册”类的著作，全面反映已有的研究成绩固然必要，但更难得的是不加掩饰地向读者公开这一领域存在的所有问题——明确了问题的所在才有继续前进的目标。比如除了上面所举的那个词组之外，在该著作所附的其他契丹句子中我们就找不到那么多与蒙古语相近的词，这很容易导致读者产生一个错觉，即契丹语在阿尔泰语系中跟蒙古语的关系非常疏远。然而我相信，将来一旦学界能够给出每个契丹字的准确转写，我们就会看到契丹语和蒙古语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近得多。就像康丹博士指出的那样，现在已经有证据表明契丹语存在像蒙古语那样的元音和谐以及表示多种语法意义的词缀，只不过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资料来描述这些现象的细节而已。

契丹语言文字之学一度被称为“绝学”，而近些时候关心这一领域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几年前我曾经为美国达慕斯大学（Dartmouth University）一篇契丹语的学位论文做过通信评审，听说现在澳大利亚也有学生以契丹语为目标开始了学位论文的写作。显然，人们正在逐步意识到契丹语在阿尔泰语言研究中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已和多年前单纯“认字”的着眼点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感谢康丹博士及时为国际东方学界提供了这样一部优秀的著作，也殷切希望《契丹语和契丹文》中提出的研究前景能够在更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尽早变成现实。

[责任编辑：吴雪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